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人工智能“大事正在发生”：
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重构

■郭英剑

2月9日,马特·舒默在个人博客上发表《大事正在发生》后,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篇长文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百万级传播。舒默并非科幻作家,而是一位深耕人工智能(AI)领域6年的创业者与投资者。

他是美国AI公司Otherside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致力于开发全球最先进的自动完成工具。

在文章中,舒默用朴实却震撼的语言描述了自己2025到2026年的亲身经历:曾经需要数周调试的复杂应用,如今只需自然语言描述需求,AI便能在数小时内自主构建、测试、迭代并交付“比自己做得更好”的成品。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人文教育研究与教学的学生者,我阅读此文时感受到的并非单纯的技术震撼,而是对高等教育未来的深切忧思。当舒默笔下的AI已能独立完成律师诉状、财务分析师建模、金融报告撰写,甚至参与自身模型的调试与部署时,传统大学“传道、授业、解惑”的根基正在经历地动山摇。

在我看来,人文主义视角要求我们不应将AI视为单纯的“工具”或“威胁”,而是视为一场关乎“人之为人”的哲学拷问。技术进步从不中立,它正在重塑我们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工作、如何生活。舒默的警示恰好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镜子: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工业时代形成的“标准化知识+专业技能”模式,大学将沦为“AI失业预备班”。

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简要探讨舒默描述的AI未来可能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具体启示。

从人工智能工具到“智能爆炸”的临界点

舒默在文章中的论述,是建立在严谨的观察与数据之上的,而非空洞预言。他首先回顾了AI能力曲线:2022年的AI模型简单计算都可能出错;2023年AI能够通过律师资格考试;2024年能撰写可运行软件并讲解研究生级科学知识;2025年底,顶级工程师已将大部分编码工作交给AI;2026年2月,GPT-5.3 Codex等新模型的出现让AI具备了“判断力与品味”。更关键的是“自我迭代”闭环:GPT-5.3 Codex直接参与了自身创建过程的调试、部署与评估。美国AI公司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指出,AI已在公司内部编写了“大量代码”,反馈循环“持续逐月加速”。

阿莫迪预测:2026到2027年,AI将在几乎所有任务上实质性超越几乎所有人。“舒默进而推演就业冲击:50%的入门级白领岗位将在1到5年内被取代,法律、金融、医学等领域首当其冲。AI不仅执行任务,更展现出“品味”——

从“活动”到“体系”：
高校应成为科学教育“长期合伙人”

■林焰清 冉云芳

近几年,中小学校的科学教育正在“忙”起来:实验室不再只是偶尔开放,科学探究课排进了课表;走廊和教室里,多了学生自己搭建的小装置、小模型;课后时间,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社团人气颇高。为了将科学课上“得更科学”,不少中小学开始主动对接高校资源,聘请大学教授、科研人员担任“科学副校长”或校外导师。

可以说,从政策导向到学校行动,从课程设置到校园氛围,科学教育正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但在对多所中小学开展调研,对高校教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听到的却往往是另一种略显无奈的描述:活动不少,持续不易。有的高校教师来学校讲过几次课,带过一轮实验项目,学生兴致高涨,但项目结束后合作便告一段落;有的实验室曾向中小学短期开放,却因缺乏稳定机制,难以长期对接;还有一些颇具创意的合作尝试,最终停留在“亮点案例”,难以复制推广。一位一线教师直言:“资源是好资源,就是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由此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一方面,国家层面持续推动科学教育体系化建设,中小学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本应发挥关键支撑作用的高校,却尚未在科学教育体系建构中形成稳定、常态的参与格局。

高校在科学教育中不可或缺

科学教育不是简单增加几门课程或几次活动,而是一项长期、系统的能力培养工程。真正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学生能否接触真实的科学?能否理解科学如何发生?能否在长期过程中持续识别和培养?从这一意义上看,高校在科学教育体系中并非“可有可无的补充力量”,而是承担着其他主体难以替代的关键功能。

首先,高校是“真实科研场景”的主要供给者。中小学科学教育往往受制于课程进度、安全条件和实验资源,难以完整呈现科学研究的真实形态。而高校集聚着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和活跃在科研一线的教师,能让学生亲历从

从人文主义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冲击绝非单纯的技术威胁,而是对“教育何为”“大学何为”的一次根本性追问。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人工智能能高效完成大量认知劳动的时代,高等教育应当守护并强化哪些人类独有的价值?



这正是此前被认为人类独有的认知维度。

在教育层面,舒默虽着墨不多,却直指要害,提出要“重新思考你对孩子说的话”。他说,我们通常认为标准的成功指南是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大学、找到稳定的专业工作,但恰恰是这种指南直接导致了“最容易被淘汰的岗位”。“我并非否定教育的重要性,但对下一代而言,最关键的是学会运用这些工具,并追寻真正热爱的领域。”

这些观点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基于AI一线观察敲响的警钟。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更需要在此基础上追问:当AI能独立完成“认知劳动”时,大学还应教什么,如何教,为何教?

人工智能未来对高等教育的多维度冲击

舒默的文章以亲历者的视角揭示了一个关键现实:AI正在跨越从“强大工具”到“自主创造者”的临界点。这种指数级自我迭代能力不仅将重塑劳动力市场,更将深刻撼动高等教育的根基。

从人文主义视角来看,这些冲击绝非单纯的技术威胁,而是对“教育何为”“大学何为”的一次根本性追问。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AI能高效完成大量认知劳动的时代,高等教育应当守护并强化哪些人类独有的价值?

我以为,AI未来对高等教育的多重冲击,体现在知识生产与传授模式、技能需求与就业准备、机构职能与生态转型三个维度上。

首先,是知识生产与传授模式的崩解。传统大学以“教师—教材—学生”的线性传授为核心,教师是知识权威,教材是固定载体,考试是验证手段。但在舒默描述的AI时代,知识生产已去中心化。人文课程如哲学史、文学批评,若仍停留在“背诵康德三批判”或“分析莎翁十四行诗结构”,将迅速失去吸引力——因为AI能在几秒钟完成同样任务,而且附带多语种、多视角扩展。

更深层的冲击还在于“知识权威”的转移。大学曾垄断认证与解释权;未来,学生可能带

着AI生成的“完美论文”进入课堂,教师需从“知识提供者”转为“智慧引导者”。若不改革,大学将面临“内容空心化”危机,学生无法学会真正思考。

其次,是技能需求与就业准备的错位。舒默预测的“认知工作替代”直接冲击专业教育。商学院培养的财务建模、法律系的案例分析、医学院的影像诊断,均可能被AI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完成。2026年的大学毕业生若仅掌握“专业技能”,将直接面对入门级岗位的消失。

人文教育本就擅长这些领域,但传统文科“低就业率”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放大。冲击之下,若大学继续“象牙塔式”培养“纯理论家”,将加剧“学历贬值”与社会焦虑;反之,若能将人文优势转化为“AI时代核心竞争力”,则可引领改革。

最后,是机构职能与生态转型的压力。在上述领域相继受到剧烈冲击后,大学作为社会机构的整体职能定位与生态系统,也正面临更为宏观和结构性的转型压力。这种压力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AI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赋予了大学新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数字化学习方式的兴起正在深刻改变大学的传统存在形态。

就此而言,从人文主义视角来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技术变革都不能以牺牲“面对面共同体”和“师生成长关系”为代价,否则大学将从根本上失去其作为“育人”机构的本质与灵魂。

构建“人机共生”的新教育范式

在我看来,舒默的警示实际上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以人文主义为灵魂,以拥抱AI为手段,实现从“工业时代大学”向“智慧时代大学”的跃迁。要将这一战略方向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路径,高等教育必须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师角色以及评估体系等核心环节进行系统性、协同性的重构。为此,我提出四个关键维度的改革路径。

首先,课程体系重构——从“知识堆积”到

“智慧框架”。核心是“人文+AI素养”双螺旋课程。保留经典人文通识,但将其升级为“AI增强版”;学生用AI工具分析柏拉图《理想国》多语种版本,生成跨文化可视化比较、辩论AI是否具备“灵魂”。专业课程则嵌入“AI协作模块”。

新增跨学科“AI人文融合”专业方向,如“数字人文”“AI与社会正义”“创造力工程”。舒默强调的“好奇心与适应力”可通过“项目驱动学习”落实:学生以团队形式,用AI辅助完成真实世界挑战,并撰写反思报告,强调“人机边界”。

其次,教学方法创新——重返“苏格拉底对话”,辅以AI个性化。传统大班讲授将被“混合式人机对话”取代。教师主导深度研讨,AI担任“无限耐心助教”;为每位学生生成个性化阅读清单,实时反馈写作草稿,模拟辩论对手。舒默亲身经历的“描述需求—AI自主交付”模式可转化为“提示工程工作坊”,学生学习如何精准“提问”AI,从而提升元认知能力。

再次,教师角色转型——从“知识权威”到“智慧导师与伦理守护者”。教师需接受持续培训,不再仅看论文数量,而还要看“学生批判性成长指标”与“AI伦理引导案例”。人文教师的优势在于引导学生追问:“AI能做,但该做吗?”例如,在文学课上讨论AI生成小说是否仍具“作者性”。舒默的“无自我”心态适用于教师,敢于承认“我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一起用AI探索”。

最后,评估体系革新——从“标准化考试”到“过程性人文档案”。取消单纯依赖AI可轻松完成的闭卷考试,转向“AI辅助+人文评鉴”组合:学生提交+人机协作项目档案;口头答辩强调即时伦理推理;毕业设计要求“AI不能完全复制的原创贡献”。

当然,改革并非坦途。舒默未加详述的“数字鸿沟”将在高等教育上进一步放大。资源雄厚的顶尖大学可率先部署先进AI,普通院校则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更深层的“身份危机”亦不可忽视。当AI承担认知劳动,学生可能产生“无用感”。人文教育应提供“意义锚点”——通过社区服务、艺术创作、哲学沉思,帮助学生发现“AI之外的自我价值”。

舒默以“未来自在,只是尚未叩响大门”结束全文。作为人文学者,我要补充的是高等教育正是那扇“门”的守护者与开启者。舒默描绘的AI未来并非终结,而是新纪元的开端。在这个纪元里,技术将极大解放人类体力与脑力,但唯有人文教育能确保解放后的“人”依然保有尊严、好奇与爱的能力。

为此,高等教育必须行动起来。唯有如此,“大事正在发生”的风暴才不会摧毁大学,而是将其锻造为更具韧性、更富人文温度的灯塔。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以下简称《纲要》)在开篇的总体要求部分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目标,即促进“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目标,是因为其代表了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方向,但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仍不清晰。理论上讲,这个战略性目标的本质与“钱学森之问”相通,“涌现”即“钱学森之问”中的“冒”出来。

《纲要》第十四条“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中提出,“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从用词看,《纲要》十分谨慎,对于新模式仍需进一步“探索”。

《纲要》第十二条“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中提出“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以下简称“优本扩容”)。这是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为目标的一项战略性举措。由于战略性举措的内涵似乎没有疑义,相关工作迅速启动。如果将“优本扩容”与“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大学的需求”联系起来,由于启动较为仓促,如何更高效地实现“优本扩容”尚未被充分研究。

“优本扩容”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较为简单和传统,就是“双一流”高校直接由高年级大一学生录取规模,这是当下的主要路径。这条路虽然操作简便,但本身是旧模式。该模式并未很好地回答“钱学森之问”,因经过扩容而“稀释”,更难以实现“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目标。

“优本扩容”的第二条路径是“双一流”高校从其他高校直接招收三年级转学学生,通过“转学”实现扩容。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看,这条路径有利于实现“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战略目标。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都经由转学促进了创新人才涌现。1926年至1930年,清华录取转学学生数占总录取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0%、6%、18%、11%、21%,江泽涵、曹禺、孙毓棠等诸多创新者都是转学生。

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院系调整使得很多学生被动转学。当时出于现实需求,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突破常规转学政策和高等教育体制约束,进行了计划性转学,在极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核工业技术骨干,这些人才随后在核能基础研究等领域发挥出战略科学家的作用。这是转学模式的第一“得”。

转学也是世界科学中心形成的关键。历史上曾有两大世界科学中心,分别是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这两个世界科学中心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创新人才持续涌现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高度重视学生流动。德国教育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指出,“德国大学的古老习俗是这样规定的:学生不应该只在一所大学接受大学教育,而是要连续在几所大学里学习。”

包尔生对当时德国大学的转学情况有所判断,认为大学转学之风盛行,学生待在一所大学的平均时间减少到3个学期,甚至更少。尤其是法学院学生,几乎每个学期就要换一所大学。

在美国,几乎所有研究型大学都招收本科转学学生,其中加州大学系统的研究型大学转学招生人数更多。此外,在本科到研究生期间,美国大学高度重视并实现了研究生的跨校流动。

转学学生在新大学只学习两年,而一年级本科新生需要在新大学学习四年。这意味着,在新增宿舍床位固定情况下,通过转学扩容,“优本扩容”的规模理论上可达到高考扩容规模的两倍,能够双倍“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大学的需求”。这是转学模式的第二“得”。

由于“双一流”高校的课程优势主要是三年级的专业课,并不在于一年级、二年级的基础课和通识课,因而经由转学实现“优本扩容”,更能充分发挥出“双一流”和其他高校各自的教学优势,促进高校之间合理分工与分类发展,实现《纲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目标。这是转学模式的第三“得”。

2025年12月,《科学》发了一篇题为《关于获得人类最高水平成就的最新发现》的文章。该研究通过分析超过3.4万名国际顶尖人士的成长履历发现,从长期来看,青少年时期的顶尖表现者与成年后的长期表现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重合。如果说在高考中“双一流”高校录取了一批青少年时期的顶尖者,那么唯有经转学所促进的学生流动,才能使那些少年和青年时表现欠佳的学生有机会流动到最佳发展和成长环境中。这为转学模式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对“优本扩容”的方向选择意义重大。

因而,经由转学实现“优本扩容”才是当下值得探索的、一举多得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在已经开启的马车,小范围改革可以“马上”开始了!

「优本扩容」何以实现 一举多得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